

歌曲《长征组歌》 红色经典永流传

□兴宣 记者曾艳华整理



《长征组歌》演出照。

一曲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旋律，一首悲壮而气壮山河的史诗，一部大合唱的经典作品将红色经典永流传。

这就是《长征组歌》。几十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在这熟悉的旋律中，闪动的是真正的激情和最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组歌》是怎样炼成的？写作这部史诗的是谁？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这部红色经典史诗背后的故事。

为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而作

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萧华回顾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半年，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随后，作曲家晨耕、生茂、唐柯、遇秋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组歌，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整个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

英雄气概，颂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西子湖畔出佳作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1916年1月出生于兴国县一个贫农家庭，他经历了长征中的主要战斗，是这场艰苦卓绝征战的见证人。1964年4月下旬，在周总理的命令和安排下，48岁的萧华因患肝炎在夫人王新兰陪同下到杭州疗养。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许多单位约请萧华撰写有关长征的作品。萧华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历者，他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他认为组诗可以概括、形象地表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几经思索，萧华确定了一种“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名、八个七字名，共12行68字，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格式，既有旧体诗词的形式美，又不受平仄、对仗的局限，铿锵有力，便于表现长征的悲壮场面，又易于记忆朗诵、谱曲歌唱，并选取了长征中最有代表性的12个典型事件，来安排组诗结构。

病中的萧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情感投入创作之中，回忆起艰苦卓绝的长征、牺牲的无数战友，他夜不能寐，常常爬起来奋笔疾书。历时半年，经过反复修改，他把12首诗歌写完，并借用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做总标题让秘书送到北京征求有关

部门的意见，座谈研究，再进行修改，前后修改了八九次，直至11月中旬，才基本定稿。

1964年11月中旬，《解放军歌曲》的一位编辑到杭州，萧华把组诗交给他，让他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要求谱成通俗、易唱、具有民歌特点的曲子，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战友文工团经过几个月创作完成了曲谱，当时考虑到组诗的后两段，是长征胜利后的内容，故只谱了前10段的曲子，并在题目下加了副标题——长征组歌。所以，长征组歌是10段，长征组诗是12段，原因即在这里。

红色经典永流传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公演，立即轰动全国。有些老红军看过演出后反映：“听了这个组歌，好像又走了一次长征。”广播电视反复播放《长征组歌》，一时间，唱组歌成为全国上下的新风尚，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争相传唱，许多人为学唱《长征组歌》，将全部歌词一字一句地抄在本子上。

大家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英雄史诗，更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红色音乐经典之作。萧华将长征的史与诗结合起来，熔铸成一部红色史诗，精心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万里长征的壮丽画卷。

《长征组歌》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调，结合长征主题，塑造了鲜明的音乐形象，把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比较完美地融合起来了。它以深刻凝练的歌词、清新优美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讴歌了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意志。

《长征组歌》创作者之一唐柯生前说过，《长征组歌》是一部集体创作成功的典范，每一部分需要他们四个人都认可了才能定稿。“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一定要把作品写好，否则就对不起长征中牺牲的几万红军战士，也辜负了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厚望。因此我们四个人团结得就像一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是用伟大的长征精神铸造而成的，所以它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它让全体演员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有造型、有情节、有人物，再加上幻灯、声光电布景的配合，一下子就把观众拉进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氛围中，再通过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感情，观众随着台上的悲壮场面而落泪，伴着台上的胜利时刻而欢呼。唱的人和听的人融为了一个整体，使它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因此，我们说《长征组歌》不但是一部成功的音乐经典，也是对大合唱这种形式的一次大胆创新。

《长征组歌》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次演出都像首演，常演常新，久演不衰。《长征组歌》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谷，(介支个)金灿灿，在采茶戏里也可以找到出处，它是一个叫数板的曲子，所以我说它是剪辑过来的。”

在婉转中传递力量

艺术源自生活。一首歌曲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革命歌曲《十送红军》正是特定时代和背景的产物，作为一首以民歌为基础进行二度创作的革命歌曲，《十送红军》的曲调婉转柔美，歌词朴实。歌曲的各段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通过采用回旋曲式手法，从而使整首歌曲风格统一。歌曲以叙事为主，并借叙事来表达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每段旋律又融进独具特色的音乐因素，使得各段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在每一段的旋律运行中，多以短句的形态出现，并且在短句的后面予以停顿。尽管在短句间歌时有短小的间奏穿插其中，然而从整体上，它依然给人以抽噎的感觉，在情绪上难脱压抑、沉重的印象。统观全歌，其音乐情感是留恋、期盼、祝福、深情等多种情绪融为一体。

有一种精神，穿越时代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红色岁月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可是那些经典旋律依然留驻。《十送红军》作为一首革命歌曲的创作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也达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正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所指那样：“《十送红军》是一首壮丽的抒情诗，一阵阵歌声，一滴滴眼泪，‘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真是语短情长，依依难舍，充分表达了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人民对红军战士早日胜利转回家乡的坚定信念。”

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 一首山歌代代传

□兴宣 记者曾艳华整理

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这首名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兴国山歌从苏区时期流传至今。它让人们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当年苏区干部穿草鞋、提灯笼、背干粮、走山路、访贫问苦的身影。那么，这首山歌是谁最先唱出来，又是怎样流传开来的呢？

来龙去脉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陪同下，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了兴国县的“模范乡”——长冈乡。在长冈乡，毛泽东和调查团的同志们脚穿草鞋分头访问群众，帮助群众挖番薯、刨花生、种油菜。

一天，在从群塘赶往火叉塘的路上，遇到了红军家属刘长秀。毛泽东不认得她，她也不知眼前的干部就是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大表嫂，去哪里呀，家中有几个人吃饭？”刘长秀照实说：“我丈夫当红军去了，大儿子也当红军去了。家中还有一女一小崽。春上，家中无米，乡政府便从公略县送来来接济我家。早几日，女儿生疖子，乡苏卫生员便送药上门。唉，共产党真是好，什么事情都替我想到了……”接着，毛泽东又来到贫农马荣海家。马荣海老人的房子不慎失火烧了一间半，乡苏维埃主席谢昌宝立即发动互济会救济他，帮工募料，帮他重盖了新房。

毛泽东了解到，长冈乡的干部确实值得尊敬。他们长年累月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自带饭包去办公，风里来雨里去，奔波、深入到群众之中。他们时时处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长冈乡的干部不仅以身作则，还严于律己，提出了出名的“十带头”“四模范”，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在乡苏干部帮马荣海老人盖房的时候，人们又一次目睹乡苏干部的模范行动，有人情不自禁地唱出了一首赞扬苏维埃干部的山歌。后来塘石村女党员钟银凤整理编写了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且教群众演唱。

1950年春，塘石乡被列为兴国县第一个土改工作试点乡，南下干部魏久明派到塘石搞土改工作。有一天，红军烈士王月香在田间劳动时，唱起了这首山歌，魏久明非常惊奇，悄悄记录下来，并把这首山歌及其来历和意义写成文章给《江西日报》投稿。这首山歌发表后，迅速流传。

20世纪70年代，江西省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罗德成在南昌首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获得广大观众欢迎。他接着又与女歌唱家马孟丹用男女声对唱形式演唱《苏区干部好作风》，给广大观众留下声情并茂、乡土味十足的深刻印象。在1985年江西音乐会上，罗德成又演唱了这首山歌，获得一等奖。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代代相传

这是一首普通的兴国山歌，也是一首传唱了80多年的红色歌谣。它所歌颂的苏区干部和苏区干部作风令人赞叹，令人向往；它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涵给人启迪，同时也令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在灵魂深处进行反思。

兴国山歌历史悠久，相传“唐时起，宋时兴”。兴国山歌所唱的内容十分广泛，常唱历史故事、传说新闻等内容，有时即兴编唱，有时长篇叙事，形式多样。兴国山歌继承了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手法，显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生活气息浓郁。兴国山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每首歌开头一句“哎呀嘞”，具有强烈的音乐旋律感，其歌声有如大水抛浪，奔腾激荡，一泻千里。

兴国山歌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当年的苏区根据地，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兴国山歌处处响起，时时被唱，对扩大红军、鼓舞士气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流传着“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

兴国山歌很有特色，很多都是老百姓即兴创作的，题材取自于生活，也体现了兴国独特的客家文化。据了解，1996年，文化部将兴国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山歌之乡”。2006年，兴国山歌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成为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2010年，兴国山歌艺术节活动被评为江西唯一“全省首届群文品牌”，同时被文化部评选为群文类政府最高奖——群星奖。

几十年来，《苏区干部好作风》一直广为传唱，歌词里苏区干部廉洁奉公的模范形象，至今仍具有教育意义。



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中干部访贫农的场景。

歌曲《十送红军》 曲调源自赣南民歌

□记者曾艳华整理

优秀的音乐不只是一首歌，每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的故事，它的魅力永远不会在记忆中褪色。

《十送红军》是一首著名的红色歌曲，1961年建军节，《革命历史歌曲演唱》在北京市中山公园音乐堂正式公演，《十送红军》一炮而红。歌词荡气回肠，曲调委婉，充满留恋、期盼、祝福之情，十分感人。2001年，电视剧《长征》播出时，以这首歌作为片尾曲，很快就红遍全国。

采风触发创作灵感

1960年10月21日，为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把时任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团长牛畅叫到办公室说，通过多唱革命歌曲，让同志们重温一下我军走过的历程，这既可发扬传统，又能激励斗志。

接到任务后，牛畅定下创作方案并获刘亚楼同意，空政文工团马上派出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等词曲作家，到革命老区湘赣两省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文工团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剧本分9场16景，共计19个组舞、46首歌曲。

在所有歌曲中，唯有《十送红军》是新编的。因为在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担任文学编辑的张士燮觉得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送别红军时那恋恋不舍的心情，这样也可从情节结构上同第三场“围剿”的戏衔接起来。随即，他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歌词综合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完了十送。

作曲家朱正本拿到歌词后，心情激荡，想起了赣南采茶戏《长歌》曲调，以及江西作曲家王庸在井冈山根据赣南民歌改编的《送同志哥上

北京》曲调，其中这些送别的曲调如泣如诉，欲言又止，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从中寻找到了创作灵感，谱写出了婉转优美的旋律。

曲调源自赣南民歌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工农红军经常需要奔赴前线，老百姓也发自内心地送别红军，因此酝酿出了许多红色歌曲曲调，这些歌曲不仅数量多，也十分具有当地民族特色。

关于《十送红军》曲调的源头，音乐界公认是来自赣南客家民歌。就连这首歌曲的编曲朱正本在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正式说明了《十送红军》旋律源自他在江西采风时得来的赣南采茶戏民歌《长歌》，又叫《送郎调》。

《送郎调》中的情景是妻子送郎出远门，边送边唱，情深意长，一唱三叹，触景生情，如泣如诉，悲切哀婉，欲言又止。这优美凄凉的旋律，不仅曲谱和《十送红军》相差甚微，就连句式、助词的运用都一样，最后通过置换新词，成为《十送红军》赣南女子为形象代表的赣南民众对红军的依依不舍。

时任赣南采茶歌舞团二级演奏员的王爱生专门对《送郎调》和《十送红军》的曲调做过比较研究，他在200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曲调在我们赣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她有很多名称，以前叫十二送妹、十二送哥、十送哥、十送郎、十送郎。整个《十送红军》的曲调，可以说就是赣南采茶戏。从头至尾一共有76小节，28小节以前基本上就是赣南采茶戏的传统曲牌《送郎调》的沿用，只有几个音符不同，就像词‘里格’‘介支个’，基本上位置节拍都没有变。28小节以后是赣南采茶戏传统曲牌的另外一个曲调，叫‘摇篮花开’。33小节开始，山上(里格)苞